

翻译

的

文化操控

——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

赵文静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小 翻译

# 翻译的文化操控

——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

**CULTURAL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u Shi's Rewriti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ulture

赵文静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 / 赵文静  
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309-05309-5

I. 翻… II. 赵… III. 翻译 - 研究 - 英文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400 号

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  
赵文静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魏南海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32 千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100

---

书号 ISBN 7 - 309 - 05309- 5 / H · 1054  
定 价 2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翻译理论模式与翻译案例互动的研究。它以翻译学文化操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André Lefevere 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和译作为案例,把这些作品置于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考察,论证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与改写,分析这些作品在形成和接受过程中如何受意识形态和赞助势力等影响并与目的语环境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本书通过对胡适案例的研究印证了改写理论的适用性。多种形式的改写在新文化运动这一重要历史转型期对建构新文学和新文化有着与狭义的翻译同等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还没有真正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本书首次从改写角度研究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强调他的改写翻译的研究价值和文学变革的影响。

本书是理论性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文本对比分析,与传统的应用性研究不同,这些分析是从文化层面分析译者和接受环境的意识形态对翻译和改写的束缚,而不是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作品和技巧进行评价。作者在利用改写理论解释我国翻译现象的同时,也对该理论进行了批判,这对建设和丰富我国翻译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 Foreword

The remarkabl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recent years has brought with it a broadening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This shift in perspective has in turn helped to situate the various textual practices that go under the term “translation” in a much broader and more complex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yet, the growing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of the field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supported by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that can demon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s at work. In particular,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non-Western translation hist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regrettably been very few and far between.

Zhao Wenjing's research on Hu Shi is a welcome contribution that responds to the current imperatives and lacunae in the field in a number of ways. First, it offers a fascinating glimpse of an era and cultural context that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not only to China but to the world at large. Second, it demonstrates in a very concrete way that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has historically been fluid and cannot be neatly separated from a variety of rewriting practices. Moreover, the story of Hu Shi's rise to fame as author, rewriter and translator provides ample documentation of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ranslations are always embedded in a complex social landscape and are influenced by an array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course of elaborating this rich narrative of an important Chinese intellectual, the study also engages

critically and productively with som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mong other things, it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indirect translation as it demonstrates how Hu Shi's interpretation of Ibsen, and his subsequent "localisation" of Ibsen's work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ere filter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s of Ibsen's English translators and critics, in particular William Archer, who translated *A Doll's House*, and Bernard Shaw, who wrote an important critical study of Ibsen. And finally, a detailed case study of a leading cultural figure in China goes some way towards redressing the undue emphasis on Western contexts that has so far dominate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r. Zhao's study is both firmly embedded in the evolving critical tradition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imultaneously interrogates it by providing a non-Western and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cultural settings and textual practices of a fascinating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It constitutes a welcome addition to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translation and will no doubt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elaboration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field.

Mona Baker

May 2006

## 前 言

本书是翻译理论模式与案例互动的研究。以 André Lefevere 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论著和翻译为案例,论证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翻译与改写,它们的形成和接受如何受意识形态等其他文化因素的操控。现存的文献资料反映出,改写理论中提出的多种改写形式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用改写理论模式有针对性地描述我国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现象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希望本书能够为拓宽理论翻译研究的范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向处于边缘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首次占据中心位置<sup>①</sup>,对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质疑和批判。“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彻底决裂的那种激进的态度,或许在世界知识分子运动史上也是无可比拟的”(Denton 1996b: 114)。这种决裂使得这个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而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国家出现暂时的文化真空局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倡导者们通过不同的翻译改写形式引入西方文化,填补这个空白。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翻译活动,是极具代表性的。社会转型大都伴随着外来理论思潮的大量引入,像胡适

---

<sup>①</sup> 作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标志之一,著名作家通常也是翻译家(Even-Zohar 2000: 118)。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特点之一。

这样的改革倡导者多为新思想、新理论的输入者。他们想要利用外来文化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的强烈动机,决定了他们在输入过程中必定要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接受环境的具体需求对外来的作品和理论进行修正和过滤,以便达到他们促进变革之目的。而他们享有的话语权力以及他们的作品构成的“文化资本”(借用 Pierre Bourdieu 的术语)使得他们的翻译与改写注定会比职业翻译家的译作有更大的市场,进而产生更大的影响。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演变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他同代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研究他对外来理论和作品的翻译和改写,不仅为翻译研究也为重新审视近代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新视角。

Lefevere 是文化操控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改写理论是当代翻译理论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Gentzler 2001)。该理论明确地向传统的原文中心论提出挑战,指出文学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和接受环境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诗学对文本的操控过程。它强调翻译既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翻译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环境中受多种社会因素的操控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写(Lefevere 1992a: 14-15)。形式上,Lefevere 将文学史中的情节概述、书评、文艺批评、改译、模仿以及百科全书等都统称为“改写”,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Lefevere 1992a: 6-7)。其原因是这些看似原创的作品通常或是对外来作品的改写、模仿(Lefevere 1985a: 215),或是“没有标出或标示含糊的翻译”(Robinson 1998d: 184)。Lefevere 指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势力以及专业人士等是译者的改写和译品的接受过程中的主要控制因素。Lefevere 强调翻译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各种改写形式(1992a),这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受传统的翻译理念所限,改写的多种形式还没有真正进入我国翻译研究的领域。然而近代历史上,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正是多种改写形式对当时的新文学和新文化构建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第三、四、五章)。因此这些改写实际上具有与传统意义的翻译同等重要的研究价值。缺乏对它们的系统了解和分析,对于诸如新文化运动这样的重要历史转型期以及其中的关键人物的研究就难免留下缺憾。这正是本书作为案例的胡适研究中存在的现象(参见第一章)。

将研究胡适的文献与改写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论著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改写。他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1917)是公认的文学革命宣言书,由此引发了新文学运动;他的“论短篇小说”(1918)“是中国第一篇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Galik 1986: 10);他翻译的《短篇小说》和他模仿外国诗歌而创作的《尝试集》都是初版后不久就多次再版,很受欢迎;他译介易卜生的系列作品:评论文《易卜生主义》(1918)、独幕剧《终身大事》(1919)以及与他人合译的《娜拉》(又译《玩偶之家》),都对当时的反封建意识、创立新文学和新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根据改写理论,上述著作均应归于改写而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参见第二章)。这些作品使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也为他后来成为东方文化巨人奠定了基础。这些改写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了胡适的重要成就,因而应该是研究这一时期胡适的最佳切入点。很多情况下,翻译成功与否以及产生影响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译品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主要取决于原文文化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目的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需要、译者的学术权威和专业人士对作品的评价。这些恰恰是胡适的翻译与改写所具备的因素(参见第三章)。因此他的作品被多次再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在数量上胡适的翻译与改写并没有严复和林纾的多,但是若论对当时的文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本土翻译的取材(如对国别文化、题材和主题的

选择)所具有的导向作用(参见第五章),可以说,胡适丝毫不逊色于严复和林纾。然而,由于现有文献极少甚至还未关注到翻译改写活动,没有从宏观上对各类改写展开系统的研究,因此在翻译文学史中,胡适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参见第一章)。

与传统的翻译研究不同,本书将翻译活动作为社会现象,从翻译的政治和社会角度对胡适这一时期的改写和翻译作品进行分析,动态地描述这些翻译活动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发生的,这些背景因素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将胡适和他的译作经典化从而影响目的语的文学和文化的演变的。书中也有文本对比分析,所不同的是,这些分析是从文化层面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束缚,而不是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作品和技巧进行评价。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概述,即这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作者通过文献资料证明,在对胡适多方位的研究中,还没有从翻译和改写角度在宏观上展开的研究。因此,在翻译文学史中胡适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位置。这一现象恰恰可以用改写理论来解释。第二章介绍改写理论。首先阐述该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即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影响。然后概括改写理论的主要构成成分。主要强调两个方面:改写的形式和多种控制因素。本章理论联系实际,用我国翻译改写的例子对改写理论进行批判。接下来的三个章节是通过对胡适不同形式的改写的分析和研究论证改写理论。第三章通过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简称“八不”)被经典化的现象阐述改写理论中的“控制因素”——如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新青年》杂志在读者中的权威、北京大学及其知名教授这些专业人士的积极支持等——是如何相互作用,使胡适的改写作品对意识形态和文学的演变产生影响的。通过对胡适的“八不”与美国意象派诗歌领袖 Ezra Pound 的“六不”进行的文本对比分析,指出胡适这篇文学革命宣言书与 Pound 的“六不”在风

格、结构以及部分内容上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胡适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需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将“六不”改写成中国版式。本章指出即使是在似乎相同的结构和内容中各自所强调的重心却不同。此外,Pound 是在讲英语诗歌的写作风格,即如何利用修辞和押韵树立意象的问题。尽管胡适也在谈写作风格与表述,他主要是呼吁文学系统的革命,通过对传统的写作方式——过多强调形式而不注意内容——的批判从整体上改良中国文学。这正是两篇文章本质上的差异。第四章集中讨论胡适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作品的系列改写,即他的文学批评《易卜生主义》和他模仿易卜生的《娜拉》而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胡适首先分析了易卜生在其英文改写者笔下的形象,因为很显然胡适接触的是英文版的易卜生。尤其是 William Archer 的翻译和 Bernard Shaw 的文学评论经典《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为胡适提供了经过他们改写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通过分析胡适对易卜生剧本的选择和过滤,说明胡适是如何结合目的语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同化易卜生的戏剧和易卜生主义的;指出在整个改写过程中,胡适绝非单纯的旁观者,他利用易卜生主义来宣传自己的“主义”。第五章研究胡适的翻译作品,即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与前面章节所描述的各类改写不同,胡适在翻译中尽量利用译者序,文内注释和加脚注等辅助语言方式影响读者对译品的解读。而在对文本的具体转换上,胡适的改写却极为谨慎,除了极个别处考虑到接受方的意识形态而做的改动,很少对原文进行明显的删减和增加。作者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改写理论对译者的操控程度明显夸大,在狭义的和广义的翻译之间缺乏明确的界定。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指出改写理论尽管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性方面还不尽完善,有待于改进,但是该理论基本适用于描述和解释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现象。翻译研究应该包括多种形式的改写,并从接受环境角度进行描述。对胡适的案例证明,这一时期翻译和改写的过程的确受到意识形态、诗

学、赞助势力以及专业人士的操控。改写对于目的语文化的变革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传统的翻译,因此具有与狭义的翻译同样重要的研究价值。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研读大量理论文献、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对翻译理论产生了许多思考。这些思考有些当时还不成熟,有些不便在学位论文中展开。因此,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一些理论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写成了此书。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恕我无法在这短短的前言里提及所有的心帮助者。然而,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 Mona Baker 教授,如果本书对翻译理论研究及胡适研究能有点实际意义的话,与 Baker 先生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能够不断得到她的指点,我的确非常幸运。先生的学问和为人都将使我受益终身。此外,在写作初期,我曾通过不同方式请教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其中包括:Keith Harvey 博士、Drian Armstrong 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刘树森教授(北京大学)、向明友教授(同济大学)、陈德鸿教授(香港岭南大学)、申丹教授(北京大学)、潘文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杨晓荣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 David Pollard 教授等。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初期的写作具有极其宝贵的启迪作用。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和跨文化研究中心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我提供的经济资助保证了我的研究得以顺利完成。我的同事和朋友以及在英国的学友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请允许我再次向以上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士表示感谢。

此书的出版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及从事胡适研究的专家杜

荣根先生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在此我谨向出版社以及所有同仁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最后,感谢我的先生尹甦和儿子尹少骞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一心不能二用,我对他们的歉意不是此刻用语言能够尽述的。

##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has been situated in a much broader and more complex research environment. The focus has shifted from the source-text and context to the target-text and contex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not only translation in the narrow sense, but also ostensibly “original” writings, which may often be instances of “rewritings” (Lefevere 1985). In addition, notions of patronage, poetics and ideology have also become relevant. Critical journal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sher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s such as critics, reviewers, teachers and translators, now come within the scop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ee Chapter 2).

Taking rewriting theory as a framework, this study reconsiders and analyses Hu Shi’s most influential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5-1923) to demonstr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works are rewritings — translation in a broad sense. By putting Hu’s works in context, the book also shows how, in the operation and reception of Hu’s rewriting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interact to canonise Hu Shi and his work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various kinds of rewritings played a crucial part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that Hu Shi’s contribution to the movement can best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writing.

A cultural giant in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a versatile and

prolific scholar, Hu Shi has bee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so far failed to give an adequat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al dimension of Hu's works, which played a crucial part in shaping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role played by Hu's translational activity deserves much mor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The study attempts to fill this important gap by contextual and textual analyses of Hu S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 this period to demonstrate how Hu rewrote foreign theories and works and why his works became influential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targe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book also attempts to assess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in terms of its coverage of forms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control factors.

## **Conventions for the Use of Chinese Pinyin and Characters**

Considering that readers of this thesis could be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inologists as well as Chinese scholars, and that they may have read some other literature referring to the same historical events and Chinese essays but in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clarity and convenience I attempt to provide a clear indication of pinyi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for relevant Chinese proper nouns, such as titles of articles, book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s well as for names of influential historical figures, events and habitual sayings. As for Chinese anthroponyms, since there are many homophones, for the most relevant figures it is necessary to indicate their correspo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besides

pinyin.

1. For the most relevant Chinese articles, books and plays, at their first appearance, they are first given in pinyin, followed by the Chinese titl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arentheses. Subsequent references are in English only.

Some of Hu Shi's articles were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these will be cited in English with no Chinese<sup>①</sup>.

- e.g. an article: "Wenxue gailiang chuyi" ("文学改良刍议"  
Some Tentative Proposals for the Refo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play: *Zhongshen dashi* (《终身大事》, *Life's Greatest Event*)

2. For the less relevant titles, at their first appearanc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ollowed by English translation; subsequent references are in English only.

- e.g. a book or a play: 《白话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Baihua Literature*)  
an article or a story: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Our Attitude Towards Contemporary Western Civilisation)

3. For relevant historical events or habitual sayings, English is used, with Chinese in parentheses after the first occurrence only.

- e.g. a historical even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辛亥革命)  
habitual saying: "Chinese learning as essence, Western

---

① The play *Life's Greatest Event* is the only exception, because Hu Shi first wrote it in English and later auto-translated it into Chinese.



learning as complement”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4. For relevant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t their first appearanc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ollowed by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arentheses; subsequent references are in English only.

e.g. 《新青年》(*New Youth*); 《独立评论》(*The Independent Review*)

5. For relevant Chinese names and publishers, at the first occurrence, pinyin is followed by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parentheses; subsequent references are in pinyin only. Many influential missionaries are better known by their Chinese names; accordingly, these are supplied in parentheses alongside their given names.

e.g. names: Hu Shi (胡适); Chen Duxiu (陈独秀)

publisher: Yadong tushuguan (亚东图书馆)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利玛窦)